

武安文史资料第七辑（一）

戏曲编导杨兰春

武安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

序 言

远在六十年代，我刚参加工作不久，就喜欢上了《朝阳沟》，也知道了杨兰春这个名字。我当时想，杨兰春真是了不起的人，编导了这么好的戏，也不知他是江南才子，还是出身于北国名门。谁承想，杨兰春竟是我们的武安老乡，一个地地道道的山里人。这既使我感到有几分骄傲，又对杨兰春其人有几许神秘。是什么机缘、什么缘故使山村里一个穷孩子能成为全国著名的剧作家、著名的导演艺术家？我到市政协任职后，编写文史资料给我提供了更多了解杨兰春的机会，于是决定编辑出版杨兰春专集，并请原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、《武安县志》主编李拴庆同志总揽其成。初稿很快编就，经再三修改，定稿付印。在这本专集里，有杨兰春本人的回忆录，有他的创作年表，有他的论文、书信及快板诗选，还有国内文艺界诸家对他的评品，可以说，这是介绍和研究杨兰春的内容较为全面的一本小册子。读这本小册子，我们不难看出杨兰春的成长道路，不难看出他的奋斗精神和纯朴的人格，不难看出他

丰硕的创作成果，不难看出他独具特色的编导风格和艺术成就……而这一切，对于我们当代的年轻人以及后之来者都是极为宝贵的精神食粮。我们应该感谢这位可钦可敬的长者。在他八十寿诞之际，谨以此小册子献上，并祝他健康长寿。

河北省武安市人民政协主席 王密珠

二〇〇〇年九月一日

目 录

杨兰春回忆录

..... 杨兰春口述 许欣、张夫力整理	(1)
• 血泪斑斑是童年.....	(1)
• 烽火与硝烟的洗礼.....	(6)
• 兰发于春 跨进文艺的门槛	(31)
• 好难舍好难忘的《朝阳沟》	(68)
• 生活 生活 浅了不行 创作 创作 就是要创	(80)
• 身子挺直腰不歪.....	(128)
杨兰春创作年表.....	(140)
杨兰春论文 书信 快板诗选.....	(142)
诸家评杨兰春.....	(217)

杨兰春回忆录

杨兰春口述 许欣 张夫力整理

〔编者的话：这里编入的是戏曲编导艺术家杨兰春的回忆录，编入时文字次序略有改动，文中标题是编者所加〕

血泪斑斑是童年

1920年的深秋，我出生在太行山的深山里——河南省武安县（今河北省武安市）列江村。“山高石头多，出门就爬坡。头顶悬崖盖，脚蹬无水河。”“列江沟，列江沟，十年就有九不收。孩子老婆逃荒走，狼虫虎豹满街游。”从这两段民谣中，可以看出我的家乡在过去是何等的贫穷。

武安位于太行山区晋、冀、豫三省交界处，东连邯郸，西达辽县（今左权县），不仅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，而且也是东西交通要道，山西的农产、山货运往邯郸，邯郸的食盐、布匹等运往山西，这样武安的商业自古兴隆，民间文化艺术也比较发达。解放前，县城里有个师范学校。我是贫农出身的穷孩子，可想念书了，就是没有条

件，只上过3年初小，高小的门都没进过。也读过《千字文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，摇头晃脑，死记硬背，却不懂是什么意思。

我父亲叫杨庆生，排行老五，生来胆子大，追打老虎、豹子、逮蛇以及给死人穿寿衣、看尸体之类的事他都敢干，方圆几十里都知道列江村有个“杨大胆”。我父亲一生从没有进过饭馆，没有穿过几件囫圇衣服。我早晚想起父亲，心情都非常沉痛。

我姐弟5个，大姐二十来岁就早逝了，小妹从小就送给了人家，家里留下我们弟兄3个，我是老大叫杨有根，二弟杨根有，三弟杨有粮（建国后改名为杨有良）。有一年过年过不去，我父亲的一个老朋友劝他把老三卖掉，换2斗玉米。母亲想让弟弟吃顿饱饭再走，可是家里什么也没有。母亲说：“仨儿，把你给人家，去吃好饭穿好衣……”弟弟抱住母亲不松手。父亲含泪面对墙坐着，用劲憋住想不哭出来，可听见了弟弟的哭声，他实在憋不住了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。我们全家都哭了。母亲下决心不卖弟弟，她说：“十冬腊月把孩子卖了，大年五更吃顿饱饭就像吃孩子的肉，要死我们死在一块儿！”后来，我眼巴巴地看着父亲饿死了。父亲死后连一双鞋也没有，还是我叔父把鞋脱下来给他穿上。天下着雨，棺材抬到地里，也没有埋。

在《苗郎审爹》剧中有一段唱词，我写的就是我父亲。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，使我自幼养成了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、生活上也很容易满足的习性。50年代初，我

还是用报纸裹腿来防寒过冬的。

我从13岁起就不愿守在家里，为谋生曾往外跑过好几次，只想着能给父亲减轻一点负担、分担一点忧愁，也为自己能混上一顿饱饭。有一次听我的一个表叔说，离我们村十四五里路有个国民党的学生部队，里面可以念书。可到那儿一看，有枪有炮，我害怕了，待了一天就跑了。我也当过和尚，随着寺院的僧人为死人举行葬礼和祭奠亡灵时敲敲木鱼，平时给寺院拾柴禾、喂牲口，这也能混上一顿玉米小米掺起来煮的饭。后来人家嫌我小就不要我了。我又找到一个补锅匠学补锅，跟着师傅在东万安、西万安两个村串乡，先是给师傅拉风箱烧火，后来替师傅挑补锅担子。可是我人瘦个小，挑起担子非常吃力，师傅只好劝我回去。他对我说：“孩子，你还太小，等长大了再来找师傅吧！”

小时候我会唱戏，在家乡我是个业余唱家，也总想找个师傅当徒弟。14岁那年，我又跑到武安西部山区陆渠村一个叫杜更会的小戏班里，恳求师傅收留。杜更会师傅是武安落子剧的名演员，专攻青衣和闺门旦，在戏班里担任主演。他看我人还聪明，又是诚心投靠，就把我收下了。那时入戏班须立个文契，内容是：“立嘱徒弟人杨有根，甘愿在杜更会名下为徒。三年满，四年圆（为师傅效力一年），悬梁服毒，投河奔井，死不见骨头，活不见肉，与师傅一字无干。头年工钱一元，二年二元，三年三元，吃住师傅供应。空口无凭，立字为证。”我看着那“悬梁服毒，投河奔井，死不见骨头，活不见肉，与

师傅一字无干”时，心里非常害怕，心想这不是等于把命卖给人家了？下午，父亲就去找我了，见了面他哭我也哭。父亲说：“孩子，咱死死在一块儿，要活一块儿活。咱回去吧，你娘还在家哭呢！”我知道父母亲是怕我到戏班里染上吸毒和赌博的恶习，就劝慰父亲放心，并保证永远不吸毒、不赌博。当时我师傅也不想让我走，对我父亲说：“老兄弟，常言说‘师徒如父子’，孩子跟着我你就放心吧！”师傅叫人从厨房拿来两个馍，塞进我父亲的口袋。我送父亲出村，父亲一边走一边回头看我。望着父亲的背影，我满眼的热泪不住地顺着脸颊流淌下来。

我有个怪脾气，师傅想让我学唱旦角，我硬是不肯，师傅就从武安继城镇（今为贺进镇）请来武师教我武功，从前塄村请来小苍头教我演小生。我的技艺不断提高，也熟背了十几部戏词。

那年在南冶陶村庙会上，我们与著名艺人刘彦祥唱对台戏。刘彦祥长得漂亮，外号“白糖”，演技好，功底厚，演薛丁山一角颇有名气。对戏那天，我们戏班唱薛丁山的小生突然病了，师傅决定让我上去顶。薛丁山的戏我也学了，但从没有正式演出过。这回我凭着年轻气盛，壮了壮胆子要同刘彦祥比个输赢，谁知我们拉头把弦的却暗中给我使了个绊子。此人名叫开泰，双目失明。他头戴礼帽，身穿大衫，戴副茶色眼镜，打扮得很气派。平时生活上都由我伺候他，如果稍不如意他就给我脸色看，甚至还骂我。有时我也不全听他的，也顶撞过他几次。此次他听说我要顶薛丁山，就在我上场前把弦调高，

有意摆治我。我一出场，第一腔就没搭上调，一下子卡了壳，台下叫了个倒彩，观众们像潮水一般拥向“白糖”的台下了。我跑回后台哭着说再也不演戏了，可又想到已经立过契约，不唱怎能行？卸了戏装，我和往常一样给师傅打好洗脸水，用小茶壶给师傅倒茶。师傅坐在那里一声不吭，一袋接一袋地吸烟，也不看我一眼，更不搭理我。我心想，今天这顿打是要挨定了，等着吧！我师傅是个明白人，他看出来今天的事是瞎子做了手脚。他沉默了好久才对我说：“学了一年戏了，你也不操点心。吃饭去吧！”听了师傅的话，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，我太感激师傅了。

初学戏时，师傅先教我蹲台（垫场）戏。这是一个讨人嫌的角色，一天三场我得三次登场。台下观众多时就喊着让我回后场，观众不多时我就得在前场应付。台下的小孩子们用棍捅台子板，喊着：“回去吧，回去吧！”每场戏我一出场，观众就说：“真讨厌，他又出来了，唱的还是老一套。”什么“前朝有个二大贤，兄弟退位让江山，兄让弟来弟不坐，弟让兄来兄不担”，唱词内容都是劝人为善的，可是一天三遍唱，观众能不腻烦吗？

后来我就产生了改戏词的想法，用新的内容来吸引观众，叫观众不讨厌我，不骂我。我小时候会背《古人名百家姓》，书中的古人一个姓一个名，一个人名一事情。我就下功夫把它改成唱词，如：“赵匡胤千里送京娘，钱玉莲抱石自投江。孙二娘夫妻开过店，李逵怒打假宋江。周文王拉纤为姜尚，吴三桂勾兵到辽阳。郑成功收

复台湾传千古，王莽篡位乱朝纲。”就这样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我把全本《古人名百家姓》都编成合辙压韵的新唱词。观众听着好听、爱听、有意思，引起很大兴趣，不但不撵我下台了，还常常鼓掌欢迎我再来一段，师傅也高兴地夸我聪明、有出息。

烽火与硝烟的洗礼

我的家乡是深山区，但这里很早就解放了，而且是个藏龙卧虎之地。1938年，八路军就在这里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，八路军总部曾驻辽县（今左权县）麻田、桐峪一带，离我们村不过几十里。彭德怀、刘伯承、邓小平、罗瑞卿、左权、李达等同志经常从我们这里经过。我曾多次见到彭德怀，他穿着皮衣。一次我看见警卫员给他买了一个烧饼，抹上软柿子吃。当地像我这年龄的人都见过彭德怀。我们村所以那么重要，因为村里驻了一个八路军的加强营，任务是保卫八路军总部。另外，白求恩医院第三所也在我们村。离村15里地的梁沟村有八路军第一兵工厂，当时靠扒敌人的铁轨为我抗日军民制造了大批武器弹药。兵工厂自卫大队曾在黑龙洞山顶构筑工事，反击日寇“扫荡”。荒庄是新华社印刷厂，离我们那儿15里。东沟村有八路军的被服厂。那时我们村里的人不分昼夜、风雨无阻地为抗战支前而奔忙：青壮年抬担架、送军粮、送柴草，还参加抗日作战；妇女碾米推磨、缝被服、做军鞋，给伤员洗衣服；儿童查路条、送鸡毛信。我们村的民兵个个能打善战、枪法好。老百姓

为抗战出了很大的力，做了很大的贡献。

“七七”事变，日寇入侵华北，时局混乱，人心惶惶，一时间戏也演不成了。我向师傅提出回家看看我娘，师傅同意了。当时师傅的家境一天不如一天，能减少一口人吃饭，也减轻师傅一点负担。临走时，师傅给我找了两双旧鞋，还给我做了一身白底蓝条条布的衣服。

记得回家的第二年（1938年），八路军就进了我们村。他们宣传抗日救国，组织群众联合起来，团结一致支援前线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。八路军纪律严明，吃了老百姓一点青菜也都要付钱；住老百姓家，走时把铺草捆好，还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人们常说“好汉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”，可这些兵咋这么好呢？通过仔细观察，我终于认识到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，就坚决要求参加。经上级批准，我光荣地成为一名八路军工作团团员，并从此改名为杨连存。当时我们虽然戴八路军的袖标，但实际上属于地方组织。后来我们那里先后成立了农救会、妇救会、青救会等组织，我是第一区青救会主任，领导我们的是区委书记张耀东（建国后曾任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部长）。

就在我任河南、山西联合村公所秘书兼我们村村长时，曾被前来“扫荡”的日寇俘虏过一次，现在我身上还留有一个伤疤。当时我正在西山安排疏散那里的老百姓，我母亲和另一部分群众都在东山。原本想着东山高，敌人一时上不去，没料到日寇的大炮一个劲儿地往山上打，结果把东山占领了。这时天已黑了，我不放心那里

的乡亲，就去东山看看情况，谁知正好与敌人遭遇。我当时身上带着一枚公章，一见日寇来了，就赶快趴到地上，把公章埋到了土里，此后不久就被敌人抓住了。

我们村被抓去的有十几个人，日寇的翻译说要把我们都送去下煤窑。这股敌军在我们村停留的时间很短，把我们带到大水蛟村关起来审问。敌人问我村里有没有八路军？八路军去哪儿了？我们都说有八路军，但不知道都去哪儿了。敌人审来问去也审问不出个什么结果，渐渐地对我们看管得也不是那么严了。一天晚上，敌人饿得一见村就进去到处找饭吃，我就趁机跑了。我跑到一个小旅店里，房顶露着天，我攀上房顶爬了出去，一看外面都是梯田，在月光下还是隐不住身。我把衣服全脱光了（皮肤和土地在月光下颜色很接近），拼命往山上跑。这时突然从山上下来一股日本兵，我立即用双手抱住头，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，才没被敌人发现，得以脱险。

古人云：“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”这两句话是古人根据亲身体会总结出来的。1943年，康生在延安发起的“抢救运动”也波及到我们山沟里。那时谁要喊一声某某是特务，此人就会立即被拉出去枪毙。一天通知说都到木作村开大会，我也和群众一块儿去了。当时我是青救会主任，还是青年团员。开会很简单，区长、区委书记都讲了话。有个部队的民运干事“左”得没法说，他说了一句“特务就在我们眼皮底下”，几个民兵就把农会主席白占江拉出去枪毙了，随即又把白有江、杨拴等人也拉了出去处死。不知谁喊了声：“杨连存也是特务，

拉出来！”几个民兵七手八脚就往外拉我。开始我害怕，但很快脑子就清醒了，我破口大骂，一蹦多高。这时会场已经失控了，乱喊口号，喊谁拉谁。区委书记张耀东急忙喊了一声：“把杨连存拉回列江押起来！”这才暂时保住了我的一条命。

我们五六个人在列江村关了十来天，就听说要把我送到县公安局。我当时很自信，心想：说我是特务，全是胡说八道，到县里一看是我，头天送去第二天准把我放回来。送我那天，全村男女老少都去看我、送我。我被五花大绑起来，4个民兵持枪押送。母亲一见我这个样子，“哇”的一声哭叫起来：“儿呀！你犯哪条罪这样折磨你？老天爷！救救俺孩子吧……”她跪在当院冲天磕头，几个婶子大娘都拉不起来。两个弟弟见我也哭起来，我不由得泪流不止。当我们走出村，站到南庙坡上回头一看，我母亲还在房上哭喊：“有——根……”围观的群众一起拥向村外。这时我心中百感交集，感到唱几句才痛快，就放声唱了一段《杨二舍化缘》：“杨玉春出庙来回头南望，回头来望不见我的家乡……”为我担忧的乡亲们都不住地啧啧：“啥时候了，这孩子还唱哩……”“噢！他也不害怕。”

我边唱边走，到了设在车谷村的县公安局。民兵给我松了绑，交给公安局等着落实问题，我想明天一准会把我放回去。我坐了一会儿，一位看守一手拿锤子、钉子，一手掂着脚镣、手铐，走到我面前问：“你是杨连存吗？”我说是。他让我坐下，把腿伸开，18斤的脚镣吭哧

吭哧就给我砸上了，双手反背着戴上了手铐，不用说这是重刑犯的待遇。我全身都酥了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两眼冒金花，真想不通自己到底犯了啥罪。公安叫了两个犯人把我架进屋，3间房关着30多个犯人，挤得满满的。我慢慢镇静下来，心里想：唉！恐怕我是完了。

就在我被关押的时候，日寇突然来“扫荡”了。我想：“扫荡”之前至少要处理几个重刑犯，其中自然有我。一天晚上集合要出发，公安把我左腿的脚镣打开绑在右腿上，这就说明今晚马上处理，我作了充分的精神准备，还想像得非常具体：可能用刀砍，以免惊扰群众。出发前公安讲：因为有情况，上面通知要把你们转移到安全地方。多数人不相信，只好听天由命吧。1条绳子拴30多人，谁也跑不了。车谷村离我村将近10里，感觉是往我村方向走。

快到我村边界时，我忽然想起日寇“扫荡”前我村民兵在这里埋有地雷，万一要踩上了大伙都得死，公安也活不成。我想报告，又怕人家不相信，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还是报告为好，以防万一。我一报告，他们可犯难了。我说：“你们要是相信我，就把我解开，让我在前边探路。我走哪儿你们就走哪儿。我要是踏上雷只崩死我一个，你们就换条路走；要怕我跑了就用枪瞄准我，见我想跑就开枪。”公安派了4支枪一起上膛瞄着我。当时我一个犯人变成了指挥员，全体人员都听我的指挥。我会埋雷也会起雷，就像演戏一样，我走几步弯腰探视一下像不像埋雷了，不像再往前走，遇到看不准的我就绕

过去。后面的人离我有几步远，都小心谨慎地踩着我的脚印走，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总算闯过了地雷区。后来民兵说，那次在我们走过的河滩的确埋了几个地雷，真是危险哪！我们越走离家越远，我多想见见我娘，看看两个弟弟啊！爬到黄岩豁岭上，就是门道川边界，公安命令犯人休息一会儿，实际他们也很累，大家横七竖八倒下就睡。这时山下村庄里的鸡子叫了起来，天快明了。

当时俺那个村有 183 人被当成是特务，还编了一个顺口溜：“管陶川，管陶川，汉奸特务数不完，下至阳邑镇，上至十八盘，一下枪毙一河滩。”不久，毛主席说话了：“一个不杀，大部不抓。”这才把我们放了回去。

1941 年起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。1943 年，八路军第 129 师第 385 旅第 13 团也在我们村开荒。这个团有几个战士是我们村的人，原来都是唱戏的。他们对刘昌毅团长说：“还有一个唱戏的，叫杨连存，反特时把他教育了一家伙，说他是汉奸特务。后来叫他参军他不干，他要求平反。”刘昌毅爱好戏曲，一听说我会唱戏，马上找到我说：“你叫杨连存？”我说：“是啊！”他说：“你是我的兵了。”我说：“现在还没有给我平反。”他说：“平什么反啊！这种情况又不是你一个人，你要是特务还会叫你参军吗？”我思想不通，吭吭哧哧不答应。团长说：“马上跟我走！”就这样，我算是正式参军了。

离村时，我没叫敲锣打鼓、骑马戴花地欢送。到部队后，我被分到重机枪排了。按我的个头不应该扛重机

枪，那家伙重得很呀，需要身强力壮的人扛。为啥把我分到重机枪排？就因为我会唱戏，怕分到连队伤亡太大。我在重机枪排那阵子，觉得再没有那么好了，真是痛快极了。当时战斗既频繁又残酷，每一仗下来都会牺牲一些同志。大家清楚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所以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：“活一天革命一天，死了拉倒；我打死一个敌人算够本，打死两个敌人赚一个；牺牲了，我算是革命到底，活得痛快，死得干脆。”

在重机枪排，从首长到战士都对我非常好。我识字不多，文化教员看我也怪机灵，就给我找了本赵树理的《李有才板话》叫我学。行军时把两个生字贴在前面同志的背包上，我边走边学；宿营时就考问我，让我读写。部队生活既紧张又愉快。凡我亲身参加过的战斗，我都编有快板，仗是怎么打的就怎么编：谁打嘞，谁攻嘞，谁拼嘞，谁冲嘞；一连怎么样，二连怎么样，三连怎么样，如实道来。我会唱武安落子，爱说个笑话，随手捡起两块瓦片，一敲打就说唱起来。平时我爱出个洋相，模仿个首长讲话、走路，学得维妙维肖。大家都叫我“活宝”，从首长到炊事员没有不认识我的。每逢开庆功会或娱乐晚会，我的快板是必不可少的热门节目。我编的快板都是取材于部队现实的战斗生活，大家熟悉的真人真事，听起来真实可信、生动活泼，对于干部战士在感情上更接近，感染力强，特别受欢迎。每次演出都要返场多次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。

1944年12月，上级命令以我们第13团为基干组成

豫西抗日第六支队（司令员刘昌毅，政委张力雄），辖第36、第37团。我所在的重机枪排属第37团。1945年4月，部队南渡黄河，挺进豫西襄城、郏县、宝丰一带，建立抗日根据地。5月，中共河南（豫西）六地委（书记张力雄）、河南（豫西）六专署（专员孔祥祯）、河南第六军分区（司令员刘昌毅，政委张力雄）相继建立。

当时，支队有一个宣传队，成员多是中学生，后来又从豫南来了一些大学生。他们非常热情，有朝气，参了军感到很光荣。支队打过登封以后，上级要调我到宣传队去，可我根据自己的条件，总觉得不适合到宣传队工作。我们支队宣教科科长陈端同志（建国后曾任河南省军区副政委）亲自来找到我说：“杨连存，你想好了没有？”我说：“我想好了，不去那儿。”他说：“你要不去可下命令了。”我说：“下命令我也不去。”当时我是死活不愿去宣传队，后来上级硬是下了命令，可我还是不想去。我们团长和营教导员也觉得重机枪排有这样一个战士，活跃活跃连队生活还是蛮不错的，也不大想让我离开，就拖一天算一天。大概拖了有一个月的样子，上级给团长、政委打来电话问：“杨连存是你们的人还是共产党的人？怎么下命令至今他还不来？他不愿意来就由他了吗？”我这才不得不去报到。

到了宣传队我能做什么呢？写标语我不会写毛笔字，唱歌我也唱不好，但我善于接近老百姓，我和老乡们一搭话就粘到一块儿了，这方面学生们不如我。每到一个地方，和群众联系的事都由我做，借个盆借个碗很方便。